

我所认识的胡乔木

○ 韦君宜（1938届哲学）



一九四八年胡乔木在西柏坡

我第一次和乔木同志接触是1939年春天。我刚到延安，住在招待所里，等着分配工作。这些等分配的青年人，一般都是由中组部通知去谈话，给个介绍信去“陕公”“抗大”，或去什么机关。我这次却没有通知，是胡乔木亲自从北门外走到招待所来找我来了。这时候，他虽然也还年轻，却已经是中央青委的副书记，是首长了。他见了我，可是一点首长样子也没有，说了名字之后，就拉着我一起出去散步，一边散步，一边告诉我延安怎么生活，又简单介绍了青委的工作，问我愿意不愿意去。我已经知道中央青委领导着青救会、民先队，办着安吴青训班。民先队有很多我的老朋友，青训班的班主任就是胡乔木，他作的班歌，我都会唱嘛。还知道他手里拿着上课铃，自己摇铃自己就上

台讲课的故事。我当然很愿意去他们那里，就这么跟上他走了。

二

在青委，我被安排做《中国青年》的编辑。我们一共三个人，都是北平来的学生，算是学生中间的笔杆子，其实谁也没有办刊物的经验。乔木这时是中央青委宣传部长，兼中国青年社社长。他看我们只会组一些青救会的工作之类稿子，他就出主意，把眼睛放开一点，想想咱们跑到延安来的青年，以至全国的青年，都想些什么，想看些什么。按着这条路子，他出了一个题目：“我怎么到延安来的。”让我们去找来延安的各方面人士组稿，何其芳的那一篇就是这么组来的。记得他曾叫我去找名医金茂岳组稿。我把一切来延安的人都看成与自己一个模式，盯着问：“您是怎么想到来延安？思想怎么转变的？”金大夫回答：“我没想过那些问题。我是由红十字会医疗队派来的。”我大失所望，就问不下去了。回去告诉乔木，乔木微微摇头说：“噫，人家什么内容都好谈嘛。”他没往下说，我却由此懂得了办刊物组稿的窍门。那一阵，《中国青年》还发表了许立群的《中国史话》，董纯才的《伊林的故事》，陈企霞的散文，王学文的《政治经济学讲话》，刘慕焜的独幕剧，还把张闻天（洛甫）过去创作的小说《飘零的黄叶》也登上了。都是乔木的主

□ 名师轶事

意，真是延安出的那些板着面孔的杂志中，从来没有过的新鲜面貌。

三

他自己的诗《青年颂》，当时也曾发表。可惜他竟不曾收集，诗又长，我背不得。我可背得他写的安吴青训班班歌，1938年写的。那歌儿曾使我深为感动：

烈火似的冤仇，
积在我们的胸口，
同胞们的血泪在交流，
英雄的儿女在怒吼，
你听见没有？
敌人迫害你，
群众期待你，
祖国号召你，
战争需要你。
你醒啊！
你起啊！
拿起你的武器，
工作学习。
一切为胜利！

今天我们在青年的故乡，
明天在解放的疆场。
听啊！

我们的旗帜迎风扬，
看啊！
我们的前途万里长。
是金紫光作曲的。

后来，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创立之后，他又写过一首校歌，这歌是：

生在英雄的时代，
站在人民的旗下，
毛泽东的双手
抚育我们长大。
坚定意志，

艰苦传统，
互助精神，
民主作风。
我们学习，
虚怀若谷，
我们奋斗，
浩气如虹。
记否仇敌未平
破碎河山未整，
同胞正在呻吟，
天下正待澄清？
太阳照临我们的肝胆，
大地倾听我们的誓言，
愿将热血灌溉人间，
种出自由的春花一片。

这些诗歌，他都没有收集。他有一本诗集，叫《人比月亮更美丽》，没有收这些。我却每唱起“祖国号召你，战争需要你”来，就觉得当年的感情汹涌而来，所以记下来给当年也曾年轻的朋友看看。

四

后来，他不在青委了，调去当毛主席的秘书，从延安到平山县，这秘书都是他当。可是到了平山，他不只当秘书了。我记得在平山时，他非常关心我们这些做文字工作的干部们，好像是分工管这事，常常找了去当面教给你怎么写。有一回我去，碰见石西民来了，老石这时已是《人民日报》（还是《解放日报》？记不准了）的头头，这时却像学生似的拿着稿子，一句一句商量，问该怎么改，而且听那意思是常来谈的。

乔木也真是诲人不倦，我们都喜欢听他的讲解。在平山我办《中国青年》，有一次他给干部们讲写作知识，拿了毛主席

写的一篇新闻稿作范例，作了怎样开头，怎样照顾全文，怎样结尾等等方面的分析。我听了觉得很有意思，就把我的记录稿整理出来，标上标题《写作范例——一则新闻》，想在《中国青年》上发表。拿着稿子去找乔木。不能说是我的，应当表明是他的，就署上个名字“听桥”。乔木看了，在用字用句不妥处作了修改，讲了改的道理，然后说“桥怎么能听？”提笔改为“听樵”。发出来了，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谁，这谜至今也没有揭开。

五

到了北京，乔木担任了中宣部副部长，他想办法教育我们这些从事文字的干部，组织各刊物各报纸的笔杆子们，到中宣部听报告。由他自己出面去邀请各方面熟悉宣传的负责干部，来给我们作报告，介绍情况。这种报告好听极了，不是官样文章，切中人们的需要。我还记得有一次讲国际宣传，是萧三同志讲的；还有一次薄一波同志讲经济，准是乔木请来的。

乔木对于各刊物是时时处处关心的，记得有一年快到“七一”了。他就把在京几个大刊物的主编找去，问大家准备怎样纪念“七一”。我是《中国青年》的，我说已准备好发表一篇《刘胡兰小传》。一同去的记得还有费青同志（费孝通同志的哥哥），他是《新建设》的，也当场说出已准备好的稿子。还有《新观察》的戈扬也准备了。没准备妥的就在那里当场研究。乔木见《中国妇女》没有，他说：“妇女怎么不来？来了两个妇女，却不是妇女，一个是青年，一个是观察。”他在那里给我们出主意拍板，《中国青年》本来是从解放区搬来的刊物，在全国文化界

我认识人很少，就全仗乔木这些碰头聚会，使我很快走进了文化界。

六

1953年，我已经三十好几岁了，青年团照规矩得把年龄大的干部输送给党，我就进了输送的名单，要上交组织部另行分配。这时中央正决定了要大力搞科技，办一些大学。新办了好几家工业学院，石油、钢铁……这八大学院都是那时兴办的。中央组织部从党员干部中间调出了一些有大学学历的知识分子干部去办这些学校。

我听到调动的消息，非常紧张。就写了封信给乔木，说明我在大学是念哲学的，我的化学在中学就不及格，干不了科技，希望他帮忙，我搞搞本行算了。

有一天晚上，乔木打电话叫我到他的住处去，我去了。碰见作家宋之的在那里，好像也是在谈工作。他谈完轮上我，我刚刚叙述了我的理由，希望试试搞文艺。乔木开口就说：“不搞科技，你去作家协会吧。”他说可以做组织工作，也可以当编辑，我真没想到一下子就来了个作家协会，我说我不是作家，在作家群中间做不了组织工作，让我练习练习写吧。他却说“到作家协会就是要写嘛”。他又说：你要生活，到作协就得去生活，要多接触人，当编辑就非接触人不可。总而言之。我要达到的一切目的，都可以通过作协去达到。谈话的结果是我被他说服，服从了他的分配。从此开始了我后半生的文学编辑生活。

七

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的时候，乔木已经是中央领导同志了。我们出版了

□ 名师轶事

《毛主席诗词》一书，销路非常好。但是有不少青年读者不大读得懂，要求出个注释本。于是我们社的几个编辑就自己注了一个稿子，我拿着这稿子去找胡乔木，请他看一看，帮着补充一下，不想这稿子竟引起了极大的兴趣。他费了很大功夫改了不少，又添了不少，对于一些该注而未注的地方，他都仔细查考，弄清楚再注。例如那首提到黄鹤楼的，我们以为黄鹤楼本来在长江大桥边，现在已经拆了，说拆了就行，不用再注了。乔木却回信给我说：原在什么地方？是大桥南还是大桥北？大桥北是左边还是右边？拆了也得有个地址，不能马虎。像这样他改了又退、退了又查的有很多处。稿子来回好多次，到最后这本注释稿简直成了乔木定稿的，成了他的稿子了。

我以为稿子由他定稿，我们可以放心，就签了字，准备付印了。他却还不满意，把稿子送给毛主席过目。可没想到，毛主席在这本注释稿上批了几行字，说：“诗不宜注，古来注杜诗的很多，少有注得好的，不要注了。”结果我们当然不敢再出，乔木的一番辛苦，全付东流。后来出了许多毛主席诗词注解本，就与这个本子（实际是最好的本子）不是一回事了。

八

乔木常看我们各出版社新出的书，人民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书，他看得更多。“四人帮”垮台之后，他也看我社新出的作品，印象如何，他虽然已经身居高位还是常发表意见。

湖南青年作者莫应丰新写的长篇小说《将军吟》问世了。这是第一部正面描写

文化大革命，毫不隐讳地写出当年种种胡作非为，包括指出当年决策错失的作品。作家协会这时开始创办第一次茅盾文学奖，慎重地提出候选作品，其中除了老作家魏巍的《东方》、姚雪垠的《李自成》之外，也有几位新人作品，最令人瞩目的就是《将军吟》。

我是这部书的终审人，签字付印以前，因为书中提到受冤的将军一个人到天安门愤怒痛哭，虽改了改，总有点担心。评委会讨论，算是平安通过。在作协评委会征求各位领导干部的意见时，我收到了乔木主动来的信。他对于《将军吟》采取完全肯定的态度，说：“真好。”还说了不少好话。我感到受到了支持。在会上我提出把这部书列为授奖的第一部。说了乔木赞赏这部书，中宣部派来的大员听到这个消息没有异议，《将军吟》就当选了第一次茅盾文学奖的头一部作品。

后来，听说乔木不赞成描写十年文革中悲惨场面的作品，说那已经过去了，应该向前看，这个意见我是不同意的。但是，他的确赞美过《将军吟》，这是真的。

最后几年，文艺界发生了不同意见。乔木对一些问题的意见和文章，我不能认同，就越来越少去找他了。但是他对于友谊看来还是珍视的，1985年吧，我们开研讨会，讨论并纪念冯雪峰，去请了乔木，他应约而来，在会上以低沉的声音说到当年上海的冯雪峰。缓缓地说着，使人们感叹。包括对于周扬，他写文章批判了周扬，但是周扬病后他又去信安慰。后来我病倒了，他也几次来我家看我，却从来没有谈及当时文艺界的争论。

（转自《思痛录》增订纪念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4月）